

SCHOLAR

第一輯

江蘇文藝出版社

學人

(蘇)新登字 007 號

學 人(第 1 輯)

主 編：陳平原 王守常 汪 暉

責任編輯：朱建華

出版發行：江蘇文藝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經 銷：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 者：蘇州印刷總廠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8.5 插頁 4

字數：450,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ISBN7-5399-0322-8/I·308

定 價：9.80 元

〈江蘇文藝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目 錄

學術史研究筆談

學術史研究隨想	陳平原(2)
學術史研究自議	王守常(6)
又一代人的學術史研究	錢文忠(10)
對歷史的重新闡釋與激進主義反傳統的學術神話	靳大成(15)
不通家法	劉 東(20)
思想史與學術史	葛兆光(27)
學術史研究門外談	梁治平(29)
關於現代學術傳統	雷 頤(33)
歷史研究與話語分析	陳燕谷(35)
學術史研究與學術規範化	蔣 寅(39)
研究邏輯·學術規範·知識增長	許 明(45)

“錢先生”在中國的命運	汪 暉(49)
-------------------	---------

——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

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陳平原(124)
----------------	----------

——論胡適的學術取向

新文化運動與“孔教”觀	董士偉(160)
-------------------	----------

——評康有為、陳獨秀之間的一場爭論

“士”形義源流衍變說略	閻步克(181)
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聖”的起源	[日]窪田忍(209)
論周禮的建構及其對村社禮俗傳統的揚弃	吳予敏(254)
逃向世界	楊熙生(284)
——論禪之精神	
背景與意義	葛兆光(324)
——中國古典詩歌批評中一個傳統方法的剖析	
李、杜、蘇詩中的時間觀念及其思想淵源	蔣寅(349)
戲與義和團運動	李林(365)
東漢“桓氏學”對訓詁學之作用	張猛(382)
試論唐代的給侍制度	李錦綉(396)
——儒家學說的具體實現	
王陽明逸文論考	吳震(417)
——就京都大學所藏王陽明著作而談	
英國普通法中的羅馬法因素	梁治平(448)
因果律、歷史主義與自主性	蕭陽(478)
傳統(儒教)文化在東亞各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作用及其異同	
——“現代化與民族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503)
A. 綜述([日]尾崎文昭)	
B. 概略、資料、發言提要(日文)	
伊藤虎丸、溝口雄三、池田明親、趙景達、飯田泰三、張立文、陳來、坂元弘子、吾妻重二、渡邊浩、黑住真、錢理群、汪暉、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伊	

藤虎丸

略述日本近期中國哲學研究動向(日文) [日]關口順(566)

英文提要 (I)

Content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A Thought abou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by Cheng Pingyua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by Wang Shoucha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from the New
Generation

by Qian Wenzhong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Radicalism: An Academic Myth
of Anti-tradition

by Jing Dacheng

Incommensurable Paradigms

by Liu Do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by Ge Zhaoguang

A Look from Outside

by Liang Zhiping

On the Modern Academic Tradition

by Lei Yi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by Cheng Yangu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and Normalization of
Research

by Jiang Yin

The Logic of Investigation • Academic Norms • Growth of Knowl-
edge

by Xu Ming

The Destiny of "Mr. Science"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Its
Use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y Wang Hui

Between Academics and Politics; Hu S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by Cheng Pingyua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Views on Confucianism; A Debate Be-

tween Kan You-wei and Cheng Du-xiu

by Dong Shiwei

On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 Shape and Meaning of "Shi" (士)

by Yan Buke

The Origin of the S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y Shinobu Kubota

On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 Li" (周禮) an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 of Tribes and Customs in Village Community

by Wu Yumin

Escape to the World: The Spirit of Zen (禪)

by Yang Xusheng

Context and Meaning: An Analysis of A Traditional Approach in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Ge Zhaoguang

The Conceptions of Time in the Poetry of Li Bai, Du Fu and Su Shi and Their Intellectual Origins

by Jang Yin

Dramas and Yihetuan Movement

by Li Lin

The Influence of "Huan" School o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y Zhang Me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Servant-Assaigning System in Tang Dynasty

by Li Jinxiu

On the Missed Texts of Wang Yang-ming

by Wu Zhen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on English Common Law

by Liang Zhiping

The Law of Causality, Historism And Autonomy

by Xiao Yang

How di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Hav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East Asia Countries?

The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 The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and its Racial Factors" in Tokyo

The Summary (in Chinese)

The Summary and Utterances(in Japanese)

ITOU Toramaru, MIZOGUCHI Yuzo, CHI Myong-kwan,

CHO Kyung-tal, IIDA Taizou, ZHANG Li-wen,

CHEN Lai, SAKAMOTO Hiroko, AZUMA Juji,

WATANABE Hiroshi, KUROZUMI Makoto, QIAN Li-qun,

WANG Hui, KIYAMA Hideo, MARUO Tuneki, ITOU Toramaru

A Grance on the New Trends of the Studies on th Chinese Philosophy in Japan

by Sekiguchi Jun

學術史研究筆談

編者按：學術史研究正逐漸引起學界同人的興趣。為此，今年一月十八日，朋友們舉行了一次學術聚會，專門討論學術史研究的發展前景。在會上發言的，依次有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王守常（北京大學哲學系）、錢文忠（北京大學東語系）、靳大成（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劉東（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葛兆光（《中國文化》編輯部）、汪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梁治平（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雷頤（《近代史研究》編輯部）、閻步克（北京大學歷史系）、陳燕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窪田忍（北京大學哲學系）、王煒（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等。會后，眾人余興未盡，又把發言整理成文，以便公諸同好。更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許明二君，聞風而動，慨贈大作。現將這組文章奉獻給同樣關心學術史研究的朋友們，期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考慮到討論時爭持不下者，在文章中也略有表露；按照原發言順序編排，讀者也許更容易見出各自論述的內在思路。

學術史研究隨想

陳平原

其實，每個成熟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從事一點學術史的研究。進入具體研究課題前的搜集評判已有研究成果並確定自己的突破口，是一種學術史的思考；茶余飯後對古今學界的褒貶臧否，也是一種學術史的品味。這種業餘的學術史思考和品味當然很有意思，可無法取代專業的學術史研究正本清源，引導學術健康發展所起的作用。

中國人做學問講究從目錄學入手，因為“學問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鄭樵《校讎略》）。在注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辯通義》）這方面，目錄學和學術史有相通之處。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其序言稱“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可學術史不只是為著作分門別類排列次序，更包括評判高下辨別良莠，敘述師承剖析潮流等等，在指示學問途徑方面，似乎比目錄學更有效。借用梁啟超一句大白話：“庶可為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從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黃氏與全祖望的《宋元學案》，到梁啟超、錢穆各自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類為數不多的學術史著作，嘉惠後學，功不可沒。

學術史的主要功用，還不在於對具體學人或著作的褒貶抑揚，而是通過“分源別流”，讓後學了解一代學術發展的脈絡和走向；通過描述學術進程的連續性，鼓勵和引導後來者盡快進入某一學術傳統，免去許多暗中摸索的工夫。當然，“紙上得來終覺淺，絕

知此事要躬行”（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沒有人單靠學術史學會做學問的。不過，學術史對於建立學術權威，顯示學術規範，使得整個學界有所敬畏，有所依循，不至於“肆無忌憚”，還是大有好處的。沒必要總結出甲乙丙丁若干“治學準則”，可當你描述和評判某種學術進程時，實際上已經正面或負面地凸現了某種學術規範。

不否認這個時候談論學術史研究，有對八十年代中國學術“失範”糾編的意圖。單用“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來概括八十年代中國學界，起碼是不公允的。我更願意將學風的“浮躁”與“空疏”歸結為舊規範的失落與新規範尚未形成。就好像“五四”大潮中的學術界，同樣也是趨新驚奇，泛言空談，介紹多而研究少，構想大而實績小。可這種偏頗，不用外力干預，學界完全可以通過自我調整來解決。茅盾將“五四”初期文學界的“雜亂”，比作“尼羅河的大泛濫”，使得新一代作家“練得一副好身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序》）。其實學術界也是如此。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這十年的學術秩序和學術規範，是對“五四”時期學界“雜亂”的合理反撥。這麼說不等於預言九十年代中國學術將有光輝前景，而是指出學術史上“傳統”與“變革”、“規範”與“失範”交替出現的周期性。如果說八十年代是學術史上充滿激情和想象的變革時代，“跑野馬”或者“學風空疏”都可以諒解；那麼，九十年代或許更需要自我約束的學術規範，借助於一系列沒多少詩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將前此產生的“思想火花”轉化為學術成果。這種日趨專業化的趨勢，對許多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單憑常識和靈感提問題的學者，將會是個嚴峻的考驗。在這方面，學術史可以提供某種入門的幫助。

之所以強調只是“入門”，因為“規範”雖則對建立學術秩序、發展常規研究有意義；但畢竟是一種束縛（儘管是必要的束縛），故成熟的學者往往部分逾越“規範”。表面上有些大學者做學問無法無天，從心所欲，其實也自有其內在理路，只不過稍為曲折隱晦罷了。就像中國詩人推崇“無法之法”，中國戲曲講究“有訓練的自由”一樣，“法”和“訓練”最終都將被超越，可沒它入不了門。目前學界的通病，不在於迷信“規範”，缺乏超越的願望和熱情；而在於過分蔑視“規範”，學無根基且自視甚高。因此，提倡一點學術史研究，對於我們這些學問不大而抱負不小的新一代學人來說，或許不無好處。

并非嗓子啞了舞臺拆了，唱不了戲，只好改為評戲；治學術史應該是一種自覺自主的選擇。在我看來，這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在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範，並確定自己的學術路向。能不能寫出像樣的學術史著作，這無關緊要；關鍵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親手“觸摸”到那個被稱為“學術傳統”的東西。有這種感覺和沒這種感覺大不一樣。所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不是指了解某一學科某一課題的研究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向，而是指獲得一種學術境界。具體的知識和技能可以講授，而這種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觸摸。對真正的學者來說，治學不只是求知或職業，更體現一種人生選擇，一種價值追求。陳寅恪為清華大學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實際上標示出一種理想的學術境界：“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也就是說，在學術流派的形成、概念術語的衍變、學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產生等之外，還必須考察作為治學

主體的學者之人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揚；可由於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學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學術的困惑與失落，同樣也很值得研究。這種研究，不乏思想史意義。

當我批評八十年代“學風空疏”時，並不意味着整個學界“思想過剩”或者只有實證研究才是治學正路。所謂九十年代中國學界將重振乾嘉雄風或重蹈乾嘉覆轍之類的說法，都只是危言聳聽。沒必要再繼續漢宋之爭，訓詁與義理、博雅與獨斷、通人與專家、尊德性與道問學，都有其價值，應該由學者依各自性格、才情、興趣、機遇作出選擇。完全沒有門戶之見即使做不到，起碼也不該入主出奴。王國維曾精辟地指出學問之“三無”：“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國學叢刊序》）。或許還可以添上一“無”：“無漢宋。”當年陸象山譏諷朱子：“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六百年後風水倒流，戴東原反過來稱：“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不同時代不同學派治學側重點當然有所不同，可不存在世人理解的沒有德性的“問學”，或沒有問學的“德性”。作為歷史課題，漢宋之爭當然值得研究；可作為現實選擇，沒必要在此糾纏不休。黃宗羲《明儒學案·序》中有一段話，對此類門戶之見頗有針砭作用：“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剿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畔道，時風眾勢，不免為黃茅白草之歸耳。”治學術史者，當有此通達的眼光；不治學術史者，也不妨在堅持己見的同時，多一點對不同學派不同治學風格的理解，減少無謂的意氣之爭。

談論學術史而不是史學史、地理學史或考古學史，似乎過於籠統，有悖專業化原則。除了承接黃宗羲以至梁啟超、錢穆的學

術思路外，還有如下幾點考慮：首先是中國學術傳統相對重通人輕專家，即便在二十世紀，好多第一流的學者也都喜歡同時在好幾個不同學術領域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績，割裂開來不好講；其次，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專業化程度不高，好多學科正式形成和發展的時間不長，硬要分別為其撰寫學史，實在有點勉強；第三，最重要的是，談學術史而不是某一學科發展史，有利於把握整個學術思潮（如古史辨）的特質及其思想史意義。

英國史學家 G. P. 古奇在其名著《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第一版序言中，自述其寫作宗旨：“總結并估計近百年中歷史研究與著作的成就，描繪本行業的大師，追溯科學方法的發展，衡量那些導致撰寫名著的政治、宗教與種族影響以及分析它們對當時的生活和思想所產生的影響。”除了有必要稍為突出學術思潮外，古奇的這番話，可以移用來描述我們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的設想。

學術史研究刍議

王守常

自梁任公、錢賓四各著一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后，“學術史”這一概念似乎約定俗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了。然兩先生之著作均未對“學術史”一詞作任何界定，而后學術界沿用此概念亦沒有一個公認的解釋規範。細加斟酌，“學術史”這一名詞是一個極不明確的概念。如謂“學術史”是學術發展史的縮略語，“學術史”傳達的含義，是一門學科的建立。那么就發生如下的問題：

其一，各學科均有各學科之史，如文學有文學史，歷史學有史學史，哲學有哲學史，政治學有政治學史……，能否於各門學科史之上疊床架屋再造一個“學術史”？

其二，於具體抽象出一般。如謂“學術史”研究旨在建立一方法論，能否獨立存在一個離“體”而言“用”的一般方法論嗎？

其三，如若“學術史”研究唯在考辨學派思潮嬗變之軌迹，其又如何有別於思想史研究？“學術史”研究與文化史研究區別於何處？

這些問題恐目前學術界尚無能定論。其實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範圍、對象、方法亦從未有過明確界定，但研究成果累累，人們也就認同這二門學科的實存。以佛教遮詮法說，把握甲非乙，甲非丙，甲非丁，那甲是什麼即可了解了。“學術史”如要確定一個實有的地位，恐怕也要透過此類遮詮法去表述。

“學術史”一詞不見於西方文化事典，只能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才有此詞意成立的背景。中國傳統文化中向有“通人”、“通儒”之說，由“小學”進“大學”，經、史、子、集熔冶於一爐之學者為數不少。這種治學方式迨至清末民初才有所改觀。西學輸入，西學分門別類之研究法，分科之教育法對中國傳統學術影響甚大。初始，以格致之學兼容西學的聲、光、電氣之自然科學，以性理之學移解西學的政法、哲學、心理學之人文社會科學。民國之後，全盤接受西方教育體制，學術研究漸已轉入分門別類的研究。通博之學者，如章炳麟、黃季剛、王觀堂是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僅有的碩果。他們雖受西學之影響，但其旨趣仍以治中國傳統之學為主臬，故被譽為國學大師。他們治學之廣博已是同時代學人不能比肩的，大多數學人只是一專門學者而已。以今日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當不會再產生“通儒”式的學者了。有噫

慧者梁任公，錢賓四整理中國學術作史昭明，仍是借重西方學術分類之術語而畢其功。兩部“學術史”立意說明清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其以“學術史”命書名，旨在陳述歷史事實。錢賓四於一九八三年再作“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分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為十二目，分門別類研討中西學相異相同，意在申明中國學術的價值與意義。其書筆法已是文化史研究。以錢賓四先生舊學素養述中學，鉤深致遠，探頤索隱，可以說是當代學界第一人。然以論西學，認為“西方思想有始而無終，有創而無成”，“西方文學重事不重情”，“西方音樂重技巧”，“西方大合奏，集種種樂器，但所奏只是此調，外別有主”，等等，已見錢先生於西學的隔礙。今日學術分門別類之詳細，又中西學之融通，再做學術史式的通博之研究，恐怕只能是勞而無功，即便做中國學術史研究，以今人受學之基礎，恐亦難擔此重任。

今日提倡學術史研究，我以為只是一個象徵意義，那即是在學術研究上提倡一極舊的新學風：認認真真讀書、老老實實做學問。

學界風氣不正，一些“學者”全然不顧各門學科專業之規範，隨意入他人“領地”，放言高論，漫肆批評。還有一類“學者”篤信“耳食”勝“眼根”，指陳他人，根本無視你書中層層疊疊的論證。

倡導學術研究能否匡校此弊，我不得而知。但返觀學術史上種種事實，體味一下前人治學之艱辛，樹立起樸素扎實的學風還是極有現實意義的。

如果說倡導學術史研究有一種“尊重事實”的象徵意義，除此，我以為學術史研究應側重考訂核實學術史種種事實。非同於

思想史重於揭明歷史事實之意義與價值。學術史研究的目的應在於給思想史研究提供“準確，無可爭辯的事實”。當然，“準確，無可爭辯”的“史實”，此一說法並不準確，尚不說遠古之史實，固於記載之偏，佐證材料之難全，不能再現其“原貌”；就是近現代史上的事實也未必能極盡客觀呈現其“原貌”。故“準確”描述事實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極盡能力搜集材料“接近”事實總是應該有的研究態度。由此，我們才可以復查學術史上“定論”的事實。

學術史研究可轉向思想史去尋求認識能力和研究方法，但學術史研究非但不能照搬思想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範疇術語，反而要為思想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範疇術語提供事實加以規範，避免其寬泛而曲解事實。如思想史研究援入大量西學範疇，其原意如何，應給予學術史研究方面的考證。這種研究並不否定“格義”說，翻譯過程中滲入的本土文化因子。學術史研究力圖使一些概念範疇術語規範化，以便可操作。

學術史研究應是不受價值觀念影響的陳述史實之技術工作。無疑，歷史上任何一件史實都有意義及價值。但學術史研究要以一種超越、平正的態度對待史料。其目的正在於保證我們檢驗前輩及今人研究成果賴以形成的事實不被推翻，真正彰顯事實的意義與價值。

綜上所言，只是就一般意義談學術史研究之態度，其實並不存在學術史研究的方法論。學術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應是兼容并包的。如果說學術研究有其特殊性的話，那即是學術史研究主要不是關注學術思想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背景材料，而是從文獻角度考訂學術研究的事例，規範學術研究的術語。

傳統通才教育鼓勵多聞博學，現今學科分工日細，術業各有專攻。我以為學術史研究應提倡“自掃門前雪”為好。研究文藝